

流动性：社会理论的新转向^{*}

林晓珊

[内容提要] 全球化时代的突飞猛进加剧了日常生活的流动性，使流动性本身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生活世界的这一剧烈变化投射在社会理论之中，便是在鲍曼、厄里、卡斯特、贝克等人的推动下，西方社会理论的前沿研究出现了流动性转向的新趋势，并使流动性成为观察和理解社会变迁的一个新维度。在现代性、全球化以及反思性现代性的相互交织中，流动性这一概念呈现出丰富的内涵，并日益演化成一个饱含生活政治意蕴的关键词，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流动性 现代性 全球化 反思性现代性 社会理论

一、流动性：理解社会变迁的新维度

流动性 (mobility) 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①在 21 世纪之前，有关跨学科的流动性研究在社会科学中仅仅处于初露端倪且相当边缘的地位，但近 10 年来却已经完全不同了，流动性的丰富而深刻的意义在约翰·厄里 (John Urry)、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和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等当代著名学者的著作里都得到了详细的阐述。鲍曼直言，流动的現代性的到来已是无需争辩的事实，他更愿意将贝克几年前发明的“第二现代性”称之为

“流动的現代性”。^②而贝克也认为，社会的流动、地理的流动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流动正在改变人类生活的环境，流动性的对象不仅包括境内或跨境流动的个体或群体，也包括整个民族社会和民族国家。^③厄里则不止一次地指出，流动性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因此必须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他认为，基于流动性的重要影响，很有必要把“流动的社会学”作为一项新的社会学议程提出来，为此，他还专门提出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新规则。^④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中，流动性更是起到了支配性的作用。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流动性进行探讨的理论出发点各不相同，然而，流动性与現代性理论的相互交织却不断地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及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共

^{*}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汽车消费与城市生活变迁——日常生活视野中的現代性体验”(课题编号:11JCSH04Y)的阶段性成果。

同致力于研究这种构成新型社会组织之特殊形式的日常生活的流动性。近些年来,在众多西方学者的推动下,欧洲理论界有关流动性的研究正形成一股方兴未艾之势,欧洲的社会科学理论中也呈现出了一种“流动性转向”。^⑤流动性研究汇聚了来自欧洲各国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他们创建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共网络交流平台,每年都会在北京、慕尼黑等地召开理论工作坊或研讨会,发表相当数量的文章和专著,其影响日渐扩大。

二、流动性:全球化的视野

流动性与早期社会学理论最主要的关联是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从本质上说,早期的社会学家更加关心的是阶级、制度和劳动分工,而不是流动性本身。^⑥但事实上,城市研究并没有完全忽略流动性,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密集性和刺激性长期以来一直与流动性的各种形式相关联。^⑦早在上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早期代表人物罗伯特·以斯拉·帕克(Robert Ezra Park)、厄尼斯特·沃森·伯吉斯(Ernest Watson Burgess)等人就已经开始关注流动性的社会本质。帕克把个人的流动性置于理解城市社会生活的中心,他认为,尽管每个人都有安家栖息的强烈愿望,但人类“另有一个特有的雄心,即:自由流动,超脱于凡俗世界之外,像纯粹的精灵那样生活在自己的精神和想象世界之中”^⑧。在帕克看来,正是流动这个事实规定了社会的根本性质,正是在不断变换环境和地点的移动过程中,人类才逐渐具备了那种为人类所特有的脑的功能,亦即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和习惯。而且也正是在移动的过程中,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特殊组织形态才得以发展起来。伯吉斯则把流动形象化地想象成“社区的脉搏”,认为流动是衡量城市新陈代谢状态的最好指标,是指由于新的刺激或新的形势而引发的与发展有关的运动变化。^⑨

如果说上述生态人类学的城市理论把流动性仅仅视为社区或社区之间的环境和地点的移动,那或许是因为当时还未能充分预见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给流动性带来的巨大影响。时至今日,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浪潮把流动性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空间背景之中,流动性已日益成为一个与社会和城市环境紧密相关的重要论题。资本、商品和移民的全球性流动和现实旅行以及网络虚拟旅行的爆炸性增长,都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同时,城市化的持续扩展也把流动性作为一个更加有意义的城市问题展示出来。^⑩就像卡斯特所说“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的一个要素而已:流动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⑪

鲍曼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认为“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否认甚至贬低这种深刻的变化是草率的。^⑫他的意图旨在描述制度、关系和习惯是如何从它们坚固的传统形式中消解成为流动的。“流动的现代性”这一隐喻式的概念简洁地概括出了现代社会的总体特征,并阐明了现代社会是如何从固态的、沉重的现代性转变为液态的、轻灵的现代性的。鲍曼还指出,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变动不居,缺乏持久的纽带,“个体化”横行。这种所谓的“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变迁的可能性和必然性。^⑬

厄里对流动性研究的兴起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他基于对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后果的深刻洞察,详细阐述了流动性与现代性、全球化的复杂关系。他的《超越社会的社会学》和《全球复杂性》两本专著使流动性成为社会理论中的主要框架。在前一本专著中,厄里考察了包含在流动性中的几种社会—空间实践,分析了其对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后果。这几种空间实践包括身体的旅行、

物品的流动、信息的流动和虚拟网络旅行。^⑭厄里还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建立“流动的社会学”，这是一个跨学科的计划，涵盖了各个涉及现代性的转变模式和社会理论的分支学科。不仅如此，厄里所提倡的作为一种新范式的流动性研究方法为沟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创造了一个新的交流空间，为流动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跨学科的视角，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过去，人们通常把流动性简单地理解为从A点到B点的物体流动。厄里指出，流动性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属性范围非常大，不仅包括身体的移动，例如从行走、攀爬到借助自行车、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等现代科技而实现的移动，而且还包括本地、本国乃至全球媒介中的信息和图像的流动。流动性的概念既包括一对一的交流，如电报、传真、电话、手机等，也包括通过网络和电脑而出现的多对多的交流。流动性的研究既包含对造成人员、信息和图像的间歇式流动的固定基础设施的分析，也包含对限制、引导和控制移动或预期移动的边界或“大门”的分析，而且它还包括考察人员运输以及消息、信息与图像的交流是如何通过数字化而逐渐聚合和重叠的。^⑮

上述学者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现代社会中的流动性做了详细的阐释，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即他们都看到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流动性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不过，尽管流动性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流动性的形式与内涵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随着现代性的转型，流动性本身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西方学者对流动性的研究仍然莫衷一是。例如，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流动性对生活、管理、工作、爱情和消费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全球化和反思性现代化的背景下，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流动性？流动性本身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社会理论的流动性转向中，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研究议题。

三、流动性、现代性与反思性现代性

斯蒂芬·拉姆勒 (Stephan Rammler) 等人认为，流动性应当同个体性 (individuality)、理性、平等和全球性一样，被视为现代性的一般原则。^⑯但是，现代性本身的发展早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后现代性、晚期现代性、高度现代性、反思性现代性 (第二现代性) 等诸多概念的出现不断对现代性的断裂与发展重新进行诠释。因而，流动性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结构性转变的辩证过程。欧洲一些学者从贝克等人的反思性现代性理论中受到了启发，对流动性的现代性意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反思性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观点认为，现代性本身已经从第一现代性转变为第二 (或反思性) 现代性。贝克认为，反思性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能动者 (主体) 所获得的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能力便越大，从而改变社会状况的能力也越大。^⑰反思性包含着对风险和无意识后果的反思，反思性的流动性 (reflexive mobility) 包含着自我批判的流动性，换句话说，反思性的流动性对其自身的无意识后果采取了批判的立场。^⑱

反思性现代性被认为是现代社会总体境况中无法预测的、无法看见的和意料之外的转型过程。它是被强大的现代社会法则的无意识后果所驱动的，这些现代社会法则包括实践中的理性、个性、全球性和流动性等。反思性现代性的阐释结束了韦伯主义和涂尔干主义的社会学传统，在韦伯主义和涂尔干主义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线性的进程。而反思性现代性认为，现代性转型的一个基本法则就是非定向的。沃尔夫冈·博斯 (Wolfgang Bonss) 等人把流动性的结构转变看作是沿着第一现代性到第二现代性的过渡而发生的变化，即从定向性过渡到非定向性。^⑲

现代社会的含义 (即第一现代性) 是与

社会安全、技术安全和风险计算等观念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的概念集中于对稳定性的思考，现代理论家认为，在社会的根本性变迁和转型之后，系统将重返稳定性。例如，《共产党宣言》中那句著名的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所表达的含义是：在旧的传统结构瓦解之后，等待它的使命是建构新的稳定秩序。“秩序的意志”贯穿着经典的现代社会理论，如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复杂性的简化”被视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而稳定性也就意味着社会情形是受非流动性支配的，社会整合的最主要概念是地方归属感和社会地位。^③我们在前面提到了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早期代表人物的观点，他们虽然强调了流动性的重要意义，但也指出了流动性对传统社区的破坏和瓦解作用，因此也同样强调了稳定性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例如，帕克认为“组成社会的个人又必须各安其所……否则，譬如说，通讯便无法维持。但是若不保持通讯联络，我们所谓社会的动态平衡便无法维持。”^④

然而，这些观点因其对全球化两面性的认识不够充分而受到批评，因为第一现代性这一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民族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贝克将其视为“方法论上的国家主义”，并提出了“全球社会学”的概念，用以解释诸如超越民族国家及其结构的网络和流动等相关现象。贝克认为，建立理论应当跨越边界，并集中研究超越民族国家和超越现代稳定性的结构。在反思性现代性（第二现代性）的条件下，流动性是一个多维概念，我们不能再从民族国家的视角来分析。单一的流动性将失去统治地位，多重的流动性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将造成流动性研究总体上的概念性转移，超越学科的境界。^⑤

第二现代性是一个不稳定、不安全和不确定的时代。在反思性现代性和全球复杂性的背景下，线性的现代化观念早已变得过时，并失去了其实用性和解释能力。第二现代性是与流动性和持续的转型结合在一起

的。随着第二现代性的出现，流动性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作为社会概念的流动性本身已经从定向性转向非定向性。换句话说，第一现代性的流动性是定向的，强调的是发展的直线性和目标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现代流动性被认为是与起源、方向和目标一起移动的。在现代概念中，流动就意味着向上爬。与此相反，反思性现代性（第二现代性）的流动性是非定向的，在它看来，笔直的道路是虚幻的，定向性肯定是要走向失败的。长时间的旅行、职业流动或网上冲浪的体验，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通常是非定向的，行动者面对的是令人失望的推迟、等待和中断。反思性的流动性的体验充满着岔道、含糊和无法理解的足迹。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流动性指的是清晰的交通和阶层流动以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直线式流动这一范例式的观念。而反思性的流动性作为非定向的流动，指的是网络流动的范例式观念，这里没有清晰的流动方向，只有重重岔道。^⑥

四、结语：迈向流动性的政治

对流动性的论述尽管还远未达到理论饱和状态，但在西方学术界的持续推动之下，社会理论的流动性转向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清晰的发展趋势。流动性绝非一个空洞、抽象、含糊的后现代概念体系，它植根于现代社会变迁的土壤之中，是现代生活的核心。在“时空压缩”日趋明显的现代社会中，追求速度、讲究效率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流动性”也因此日益演化成一个饱含生活政治意蕴的关键词汇。例如，在鲍曼看来，流动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认为，在资源稀缺和分配不平等的社区中，持续流动的自由很快成为了晚期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分层因素。他将流动层次的上升视为现代生活的建构元素，正是这种自我的“流动性程度”决定了其在这一层次体系中的位置。在卡斯特看

来,流动的能力是在社会中存活的能力,流动权力的掌有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群体、社区和城市的发展和生存。在现代社会中,小至日常生活所需的往来流动,大至国际贸易的流通交换,流动能力越高,流动速度越快,就会在社会各种关系和事物的运作过程中占据越有利的位置。掌握了速度与流动能力,形同掌握了社会权力,反过来说,速度与流动能力也正是权力的表现。对于个体而言,是否具备一定的流动能力,已成为其是否能够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可以说,流动能力既是参与社会过程的条件,也是社会权力的表现。

艾伦·杜宁(Alan Durning)曾经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在工业时代以前,幸运者和不幸者在交通速度上的差别是马的平均速度和人的平均速度的差别:富人骑马,穷人步行。并且这种分化持续了几个世纪。但在上个世纪,这种差别已经爆炸性地扩大了。今天,穷人仍然以大约和以往一样的速度在走路,但是富人却已经从时速为10公里的一匹马的速度提高到时速为1000公里的喷气式飞机的速度。^②保罗·维希里欧(Paul Virilio)以“速度统治型”来形容这种流动性社会的权力结构。他指出,随着速度统治型进化的实现,人类不再是各色各样,而是只区分为“有希望的人群”与“绝望的人群”,前者拥有一个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将会达致他们正在积累的速度,这将使他们得以通向一切可能;后者则被低劣的技术交通工具所阻碍,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维持生计。^③这一区分看似夸张,却并非无稽之谈,它所流露出来的一个意象是:在全球化的社会,流动性已经成为生活政治的一个隐喻,并在阶层之间、性别之间带来了显著的差异,由此成为反思性现代性进程中的焦点之一。■

注 释

① Jörg Beckmann, “Mobility and Safe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21(4/5), 2004, p. 81.

②⑫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5、12页。

③ Ulrich Beck, “Mobility and the Cosmopolitan Society”, in *Mobility and the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eds. by Wolfgang Bonss, Sven Kesselring and Gerlinde Vogl, München: Sonderforschungsbereich, 2004, p. 42.

④⑭ John Urry,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18-19, pp. 49-74.

⑤⑮ John Urry,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in *Mobility and the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eds. by Wolfgang Bonss, Sven Kesselring and Gerlinde Vogl, München: Sonderforschungsbereich, 2004, p. 25, pp. 26-27.

⑥ Geoff Payne, *Mobil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Socie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7, p. 1.

⑦ Mini Sheller and John Urry, “The City and the C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24, 2000, p. 740.

⑧⑨⑲ [美]罗伯特·以斯拉·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156、58—59、156页。

⑩ Niels Albertsen and Bülent Diken, “Mobility Justification and the City”, see <http://www.comp.lancs.ac.uk/sociology/soc082bd.html>.

⑪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页。

⑬ [美]乔恩·威特《社会学的邀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⑬ Stephan Rammner, *Mobilität in der Moderne.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r Verkehrssoziologie*, Berlin: Edition Sigma, 2001.

⑰ [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4页。

⑱ Jörg Beckmann, *Risky Mobility: The Filtering of Automobility'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Copenhagen: Copenhag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⑲⑳㉑㉒ Wolfgang Bonss, Sven Kesselring and Gerlinde Vogl, *Mobility and the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München: Sonderforschungsbereich, 2004, p. 48, p. 11, p. 10, p. 50.

㉔ [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㉕ Paul Virilio, *Speed & Politics*, New York: Semiotext(e), 1986, p. 47.

[林晓珊: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工作系,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博士后流动站]

(责任编辑 吴 迎)